

清末哈密“改土归流”研究

郭胜利

内容提要：光绪三十三年，哈密通判陈天禄在清末边疆危机形势之下，利用哈密地区民众开展了“改土归流”运动，它反映了清末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矛盾和政治一体化的历史趋势。虽囿于诸多因素，此次运动最终失败，但是其对哈密地区影响深远。

关键词：陈天禄 哈密 改土归流 沙木胡索特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2）01—0044—11

哈密地区“改土归流”，其源可溯至新疆设省前后，发其端者，由左宗棠、刘锦棠始；肇其行者，缘陈天禄为；竟其功者，殆金树仁止。然左、刘之议，是为新疆开省之需，故哈密“改土归流”，其本应从光绪三十三年通判陈天禄鼎革谈起。然对此一段变故，研究者除却蔡锦松、蔡颖^①等极少数人有较为详细论述外，余则多寥寥带过。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此次“改土归流”内在因素、发展变故、清末边政变革以及对之后哈密地区影响做一重新认识，以期还陈天禄及其“改土归流”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早期政治体制下之冲突

乾隆二十三年，清朝于哈密设立办事大臣，办理哈密粮饷、回部以及往来一切政务。1884年后办事大臣裁撤，唯哈密通判留之，通判下辖巡检一员，分别管理“地土民情往来大臣官员差役遣犯盐菜口粮骡价车价等事并官兵养廉粮饷”^②，以及监狱兼地方事务。汉人和不属于札萨克亲王的回民及蒙古人亦为哈密厅所管辖。而“所有回户皆伊萨克（即第五代旗长）之阿拉巴图（奴）”^③，回部民向回王纳税、申诉法律纠纷。1907年日野强至时见到“（哈密）以通判为长官，巡检一名为副手，以下在各个村落设乡约。官府有事即责成乡约办理，下情均经由乡约上达”^④。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对哈密札萨克旗制未予触及，农奴制生产关系依旧存在。^⑤虽此时之

① 蔡锦松，蔡颖 《一九〇七年新疆哈密维吾尔族农民暴动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

② 〔清〕钟方 《哈密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09页。

③ 〔清〕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一，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④ 〔日〕日野强著；华立译 《伊犁纪行》，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⑤ 王希隆 《哈密达尔罕伯克额贝都拉及其投清之影响》，收入氏著 《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30页。

哈密经济已经开始处于封建地主经济过渡时期,^① 由于经济上与王府存在严重的依附关系,哈密地方基层民众实际上依然处于王府都尔嘎控制之下。

1884 年新疆设省,吐鲁番及南疆回部地区旧有的王公伯克幸存甚微,此类地区开省置县是为水到渠成。由于哈密于勘定新疆之役效力颇多,故其旧有王公札萨克制度得以保存。但旧有体制与现行省府制度之冲突、中央集权与地方独立之矛盾却日渐显现。

哈密所处之战略位置对于整个西北边防之意义自不待言。因而,朝廷有识之士对之颇有隐忧。左宗棠就哈密地区制度问题上奏朝廷,指出:

哈密厅旧设通判一员,原兼理地方事务。其土著户民,向本回族种类。所有诉讼案件一切,均系回目台吉、伯克等办理;所有回户滋生多寡、物产盈虚,通判不复过问。是虽久隶版图,实仍各分气类,望其一道同风,而政教难施,渐靡无自,何以致之……所有一切兴革事宜,均应责成哈密厅承办。援照吐鲁番例,兼管回务,缠回仍归地方官治理。一切诉讼案件,概由官审断申报。其回目台吉、伯克向以催纳贡粮为事,姑仍其旧。如有横征苛派病民情弊,许回民赴官申理。(军机大臣奉旨“着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②

光绪十三年九月,理藩院知照有关部门“仿吐鲁番同知之例,改铸哈密通判兼管理事回民事务官防一颗颁行领用”^③。

哈密回部王公政治地位亦非一日而就,《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载:康熙三十六年,清政府封额贝都拉为札萨克一等达尔罕,雍正、乾隆年间朝廷一直对之恩宠有加。道光二十年,晋多罗郡王,咸丰三年,赐亲王衔,同治六年,追封和硕亲王。光绪七年,侄沙木胡索特袭。^④ 管理哈密五堡及各处回民入册者一千九百五十余户共大小男妇一万两千六百余口。^⑤ 回城设有回王府及衙门,职掌王府及回部民政、宗教、司法、经济文化、农田水利、王府之内政外交、武装守卫诸方面事宜。在司法上,“凡两造俱系回民案件,应令将人犯交札萨克公经营。”^⑥

对于王府在哈密地位,佐口透认为,“(哈密)其地位相当于所谓的‘公国’,哈密王是直接统治哈密属民的君王,清朝在哈密同在回部其他地区一样设立行政、军事统治机构,原则上不干预哈密居民的生活”,但是“历代哈密王作为伊斯兰王公都只是在清皇室的庇护下才能行使领主权,才有可能拥有对属民的一切专权”^⑦。

归复新疆之后,清政府逐渐把“命盗、钱债、田土、户婚事故各案件”收归“局员察律办

① 黄建华《沙木胡索特统治时期的哈密维吾尔人的农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② 《哈密回务请由哈密通判兼筹折》(1880年9月11日),左宗棠《左宗棠奏稿·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585页。

③ 《镇迪道就土尔扈特蒙众等改归地方管理事给吐鲁番厅的札》(1887年12月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近代新疆蒙古历史档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④ [清]会典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

⑤ [清]钟方《哈密志》卷五十一《回部志》,第216页。

⑥ 常钧等辑《敦煌杂钞·哈密》,卷上,1937年4月禹贡学会钞本。

⑦ [日]佐口透著;邢玉林,阿拉腾奥其尔译《新疆哈密的伊斯兰王国——哈密郡王统领史》,《东洋学报》1991年第72卷第3、4号。

理”^①，不久改哈密通判为直隶厅同知，哈密通判兼管回务，“一切词讼案件，概由官断申报”，伯克若不称职，“上司”有权“换替承充”。^②至此，清政府开始改变前期“原则上不干预哈密居民的生活”的方针，开始逐步收回王府的司法、民事、税收等权力。王府方面，由于其“只是在清皇室的庇护下才能行使领主权，才有可能拥有对属民的一切专权”，故而，两者之间虽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囿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因素制约，两者之间的冲突并没有以直接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其他间接的方式曲折显现。

二、置省后各方矛盾之显现

（一）朝廷与王府关系之变化

《清实录》载：

伯都讷副都统明春奏札萨克回子亲王沙木胡索特因兵燹之后，修理坟墓，请赏借俸银，得旨。著照所请。准其借支十年俸银二万两。以示体恤。^③

甘肃新疆巡抚刘锦棠代奏回子亲王沙木胡索特请觐。得旨。著准其按班朝觐。^④

哈密回子亲王沙木胡索特感受足疾呈请暂缓进京朝贺允之。^⑤

以捐助军饷，予回部亲王沙木胡索特奖叙。^⑥

以因公捐输，赏回子亲王沙木胡索特黄马褂。^⑦

庚申赏哈密回子亲王沙木胡索特穿带蟒貂褂。^⑧

由上观之，1884年新疆设省之后，朝廷对哈密王府一直恩宠有加。对于朝廷德意，沙木胡索特亦上折表示“勤修斋勉循敬戒溥圣朝之雅化”^⑨。光绪三十三年二月，沙木胡索特复上折朝廷答谢圣恩。对于朝廷的恩赐封赏，屡请巡抚联魁代奏答谢圣恩。甚至于晚清飘摇之际，其亦不忘向朝廷表示效忠。朝廷囿于内地形势变革，电寄袁大化、电奏悉哈密沙木胡索特贡差，著俟路通再令进京。^⑩

从史料记载观之，朝廷对于王府眷宠一直未断，王府与朝廷之间似并未存在问题，但通过左宗棠奏折及刘锦棠上书，置省前后，清政府在维持总体稳定前提之下，还是默许了事实上对哈密旧有体制的变革，两者的关系相对之前已经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左宗棠时援吐鲁番例兼管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五十七卷，第1页。

② 《哈密回务请由哈密通判兼筹折》（1880年9月11日），左宗棠《左宗棠奏稿·七》，第585页。

③ 《德宗实录》，光绪九年癸未六月己酉朔。

④ 《德宗实录》，光绪十二年丙戌秋七月壬辰朔。

⑤ 《德宗实录》，光绪十四年戊子十一月戊申朔。

⑥ 《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月丙申朔。

⑦ 《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四月辛巳。

⑧ 《德宗实录》，光绪三十年甲辰十二月。

⑨ 《奏为据请代奏叩谢天恩折》，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一一五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574页。

⑩ 《大清宣统政纪卷之六十五》，宣统三年辛亥冬十月乙未朔。

一切案件，其后刘锦棠时又把哈密回民事务奏请归哈密通判管理^①，王府方面虽则对于朝廷“藩部内属、行政一体”的改制多有微词，但是囿于自身经济实力衰退、政治和军事地位的降低，已经无力与中央相抗衡，故而只有采取捐助军饷、因公捐输、请觐等方式竭力向中央输诚，以期保留固有的权益。而正是这一变化使得后来通判陈天禄在哈密“改土归流”，并采取“接收稟词后亦未详请示遵”方略。

（二）哈密地方与王府之矛盾

有清一朝，内地与朝廷为新疆协饷、专饷总额近四亿两^②，几乎相当于清政府10年财政总和。协饷用途主要分为驻屯官兵俸饷、蒙古及回部王公、伯克、台吉、喇嘛岁俸。建省之初，“甘肃新疆岁饷耗近岁财赋所入六分之一”^③，光绪十一年刘锦棠、谭钟麟会商后，决定自十二年起关内外军饷每年共计定为480万两。辛丑之役后，中央财政日益困难，自光绪三十年起，甘新协饷被减少为440万两，再加上每年负担70万两庚子赔款，甘新协饷实则减为370万两。^④而当时新疆巡抚项下岁需就达250.145万两^⑤，再加上各省拖欠之数，光绪三十三年前后新疆财政经济窘境可想而知。对于哈密厅而言，由于整体财政状况的恶化，每年由省府解下来的经费更少。

1884年前，哈密厅“岁征商民进关口票每张税银四钱”^⑥，哈密厅银库经费开销每年需要5万两，供给各官厅、驻卡、遣犯、王府、过往官员及外藩朝贡驻蹕之需。^⑦1885年，哈密厅设立税局，开始对境内行商坐贾收取赋税。王府在回城亦设有巴扎伯克，但是对新城老城的税收不能过问，由哈密厅统一管理。^⑧实际上“汉民欲至各缠庄交涉贸易者，非领回王路票亦不敢入”。^⑨故而此一税项对于哈密厅庞大开支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要想解决财政困难，此时只有把注意力转到民间，但哈密地区财政实为王府所控，哈密回王直接统治之城邑有“哈密、素木哈尔灰、阿思他纳、托哈齐、拉珠楚克、哈拉托巴”^⑩。根据马达汉1907年的调查，哈密人口当在1.8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缠回。^⑪哈密通判所辖者为汉人和不属于札萨克亲王的回民及蒙古人。据《新疆图志》所载“其地膏腴之土，多属王业……有采地三万”^⑫，到沙亲王时期，耕地面积扩大到三万四千二百多亩。^⑬到民国初期，王府还“有羊十余万头，牛马各数千头，骆驼数十。岁收田租变卖银钱均埋于地下，知其底蕴者云，至少五百万元”^⑭。

① 刘锦棠《蒙部缠回改归地方官管辖并改铸关防片》，《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年，第1605页。

② 齐清顺《清代新疆“协饷”和“专饷”》，《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③ 沈桐生《光绪政要》（第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562页。

④ 袁大化，王树枏《新疆图志》，卷一百五，天津博爱书局，1923年。

⑤ 袁大化，王树枏《新疆图志》，卷七十四。

⑥ 〔清〕钟方：《哈密志》卷二十一《食货志四·杂课》，第93页。

⑦ 〔清〕钟方：《哈密志》卷二十《食货志三·经费开销》，第85~92页。

⑧ 苏北海，黄建华《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王历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0页。

⑨ 《新疆乡土志》，《哈密直隶厅乡土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70页。

⑩ 〔清〕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一，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⑪ 〔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40年，第391页。

⑫ 袁大化，王树枏：《新疆图志》，卷二。

⑬ 《哈密王的政教合一统治》，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一辑，第20页。

⑭ 林竞《西北丛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31页。

因哈密回部亲王“在同治叛乱期间向清廷贡献过军费，又有捕拿回匪首领之功，故规定当地的缠回一律向王爷缴纳赋税”。虽则地方“租税缴纳谷物，大体每亩地征麦一斗三升，其中两成到了地方官员手里”^①。实际却是“田归回民耕种，入粮于其王，满汉官无与焉”^②，而且哈密厅权力有限，其财赋所入寥寥无几。王府为自身利益，对于此一部分权利让渡势难从厅府之意。因之缘经济权利争夺在所难免。由此所致“地方官和王爷极少往来，除诉讼公事等万不得已的情况外，互无来往。需要见面时都是地方官前往造访王爷。然而地方官的言谈里常常流露出对王爷的轻蔑之情”^③。正是哈密厅与王府之间的不和谐，方有后来之“五月二十六日和加米雅斯、杜格买提勾串匪党造谣敛钱，称厅官奉文缠民归厅管辖，不供回王粮差”^④出现。

光绪十三年后，清政府开始注意对哈密旧有体制的变革，哈密“该地方回务，前左宗棠奏准照吐鲁番例，由哈密通判兼管办理，数年汉、回称便”^⑤。哈密厅辖地汉回称便的前提是对旧有王府权利的转移，此举势必有害于王府权益。特别是1884年哈密办事大臣裁撤之后，所遗留的职权划分转移问题，虽则哈密通判原则上兼理回务和一些诉讼案件，并未得到实际落实，名义上权归地方，实则却为王府所控。虽同为朝廷治下的地方政权，但是囿于历史、民族、宗教以及边防诸方面缘由，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矛盾。

（三）民众与王府之矛盾

1907年日野强经过哈密，对回王与民众之关系曾有深刻认识“回部王与民众的关系大体如同路人。”^⑥橘瑞超在拜访哈密回王后亦提到“对部族的统治过于严酷，同族中反对的人也有不少。”^⑦究其缘由，杨增新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哈密缠民向与回部沙亲王因差徭繁苛，感情甚恶，又沙亲王系老回王之妻侄承袭王爵，并非嫡嗣，故缠民多有不服。”^⑧再加上“沙木胡索特其人微不足道，卑贱又不诚实，是可轻蔑的暴君”。^⑨“(王)显得奉承和懦弱……使人有厌恶之感。”^⑩

王府苛刑重赋，是王府与民众的根本矛盾。对此中外史料颇有所载：

王爷处罚缠回极严，轻犯打五尺之棒，对重犯实行密处，进而处于流刑，即在数百

①〔日〕日野强著；华立译《伊犁纪行》，上卷，第98页。

②〔清〕林则徐《荷戈纪程》，光绪三年宣武刊本，第20页。

③〔日〕日野强著；华立译《伊犁纪行》，上卷，第98~99页。

④联魁《讯结哈密缠回聚众滋事分别惩办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一一五册，第574页。

⑤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九，第1182页。

⑥〔日〕日野强著；华立译《伊犁纪行》，下卷，第340页。

⑦〔日〕橘瑞超著；柳洪亮译《橘瑞超西行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⑧《电呈哈密叛缠情形现派都司张彩廷前往招抚文》，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乙集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291页。

⑨〔俄〕格鲁姆·格尔日迈洛《西部中国旅游记》，圣彼得堡，1896年，第473页。

⑩〔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1940年版，第381~382页。而在〔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著；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9页）的记载中，哈密王沙木胡索特（Shsh Maksud）“是一个非常精干、聪明、可爱的人”。橘瑞超在其西行记亦记载：最通达世情而且理解力丰富的人。见〔日〕橘瑞超著；柳洪亮译《橘瑞超西行记》，第104页。

里外的沙漠中服苦役。他还实施死刑。他有羊十五万只，主要由流犯放牧。^①

1892年N·T·卡塔诺夫对于哈密徭役情况做了实地调查：

哈密缠头在三个月冬季的21天中，为王积运粪肥，没有报酬。不能用车运的穷人则在冬季每月运土7天。王夫人令农民每月劳作5天，从事土木工程。在夏天小麦成熟时，王令他们的夫人收割10天并妥善运储。王驱使他们服徭役，服役期间既不给一片面包也不给劣币一文。因王必入觐北京，故也屡征谷物，王从富家取一麻袋（224公斤），从穷户取5库列（112公斤），从大富户中取4麻袋，从自耕农中白拿2麻袋。^②

后来参加1907年起义的人追述“王府的劳役太沉重了，我们累折了腰也完成不了。王府的四万亩农田要我们耕种、收割，还要我们提供种籽、耕畜、耕具，他的牧场也由我们照管，并且限定每年孳生幼畜的数量。此外我们还要参加王府的运输、土木工程、家务以及对官府的差役劳动。”^③沉重的徭役使得“一月中，每户缠民得做己事者，不过六七日耳，余均供回王及头目之差，妻女亦轮流前往执役”^④。

严酷的刑罚，沉重的赋税，无止境的徭役，落后的农奴制经济与新疆其他地区相比，已经成为制约哈密地区经济发展的桎梏，因而“改土归流”成为广大下层民众的迫切要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必然。

（四）王府宗教地位的变化及与宗教下层之矛盾

在陈天禄“改土归流”运动中，他“突将匪党毛拉惹吉派充乡约，该毛拉惹吉复听和加米雅斯、杜格买提唆使，聚众抱经盟誓，复入回城滋闹，威胁城乡善良缠民不许归回王管辖”^⑤。由是可知，宗教阶层在此次“改土归流”运动中的积极作用。

关于哈密王府政权的性质，佐口透认为“被授予札萨克爵位而崛起的是哈密郡王，他在东突厥斯坦最东部的哈密建立了伊斯兰地方政权”，王希隆先生认为哈密施行的是军政合一的札萨克旗制，具有土官的性质。^⑥对于哈密王之出身，《哈密王的政教合一统治》的作者认为其先世是来自阿拉伯的传教先驱，为阿拉伯人，非哈密原住民。^⑦但在《重修肃州新志》中记载：“（其先世）本回子头目。”^⑧光绪年间，新疆巡抚陶模在《辛卯侍行记》中记载：“（回王）先世系白帽回，相传多畏兀儿回子孙。”^⑨因此佐口透先生推测“他可能不属于察合台汗家族而是土

① [日] 日野强著；华立译 《伊犁纪行》，上卷，第143页。

② [俄] N·Th·卡塔诺夫 《遗留下来的东突厥斯坦民俗文献》，第2卷，卡尔·孟格斯刊布，1933年，第17~19页。

③ 包尔汉 《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1页。

④ 陈赓雅 《西北视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349页。

⑤ 联魁 《讯结哈密缠回聚众滋事分别惩办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一一五册，第574页。

⑥ 王希隆 《新疆哈密维吾尔族中的札萨克旗制》，王希隆 《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第252页。

⑦ 《哈密王的政教合一统治》，《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一辑。

⑧ 黄文炜编撰 《重修肃州新志》，《西陲全册·六》，张羽新 《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二十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396页 《敦煌杂钞》卷上《哈密》亦载：自后首领竟系吐鲁番回子，不复元裔矣。

⑨ 陶保廉 《辛卯侍行记》，卷六，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370页。

著的豪族。”^①王希隆先生亦认为“额贝都拉先世为哈密土著维吾尔首领的说法最有说服力。”^②1912年,大谷探险队队员橘瑞超到达哈密,访问了“哈密亲王和卓木”^③,1928年,斯文·赫定访问哈密,在《穿越戈壁沙漠》中记述“部下呼其(回王)为帕地夏。”^④但是在沙木胡索特给新疆巡抚陶模的回信中提到其先世“额贝都拉之高祖伊萨敏、曾祖博启、祖默默特雅尔、父默默特夏伊,四世皆为伯克”^⑤,因之,此亦排除回王宗教上地位。伯锡尔故后无嗣,其妻将己女嫁与沙木胡索特,以沙木胡索特出身aq-Suyok(白骨头)之故,^⑥于光绪八年,得到了清政府的册封入继袭爵。^⑦

虽说在一些外国人的记载中,沙木胡索特还被称为“和卓木”、“帕夏”,但其宗教上地位实非如是。有清一代,“和卓迅速繁衍而又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度,任何人都可以自编谱系冒充圣裔,结果和卓满地走,圣裔大泛滥。”^⑧和卓家族最后退出新疆的历史舞台,也就成为势所必然。^⑨因此,无论沙木胡索特是否还有和卓家族光环,其宗教地位下降是必然的。这就造成了其在教民心目中宗教地位的下降,才会有众多缠民一呼百应,走上街头。

对于宗教的管理,王府之内小台吉之下附设管理各区宗教审判事务的宗教审判两人,根据宗教法规裁决遗产的宗教事务主管三人,王府还指派9名民事阿訇,各负责一定范围内的宗教民事。在沙木胡索特时期,哈密新、老城设有两座大清真寺,其规模及政治地位在哈密所有维吾尔族清真寺中居统治地位。其掌教大阿訇是王府统治核心集团成员,处事秉承回王旨意,回王通过掌教大阿訇控制着整个礼拜寺系统。^⑩王府利用阿訇向缠民灌输“王爷、阿訇、巴依和农民、牧民之分都是安拉决定的”,这些高级阿訇所代表的只是王府的利益,是王府在宗教上的代言人。随着和卓地位的下降、下层民众经济状况的恶化,以及沙木胡索特身份的差异,其与下层教民和毛拉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化为以经济基础为内容的宗教矛盾。因此出现了商人和加米雅斯利用伊斯兰教在教徒中宣传“《古兰经》上写着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维王世代代骑在我们头上,为什么我们世代代都是奴隶,我们要争取自由生活的权利,我们必须推翻维王的统治”^⑪。

上述缘由,使得王府成为当时社会诸方面矛盾问题集中所在,因而对其进行变革已在所难免。

①〔日〕佐口透著;凌颂纯译《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②王希隆《哈密达尔汉伯克额贝都拉及其投清之影响》,第224页。

③〔日〕大谷光琰等《新西域记》,下卷,东京:有光出版社,1937年,第795页。

④〔瑞典〕斯文·赫定《中亚探险纪行全集》6(9),《穿越戈壁沙漠》,第324页。转引自〔日〕佐口透著;邢玉林,阿拉腾奥其尔译《新疆哈密的伊斯兰王国——哈密郡王统治史》。但查诸国内版本,并未见该条记录,因之,此条应为日文版之Heden·S:《シルケロド(ヘディン中央アジア探险纪行全集9)》,〔日〕西义之译,东京白水社1965年版所记载。

⑤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第370页。

⑥〔俄〕格鲁姆·格尔日迈洛《西部中国旅游记》,第472~473页。

⑦《德宗实录》,光绪八年七月戊戌。

⑧潘志平《和卓崇拜的兴衰》,《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⑨马汝珩《略论新疆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⑩苏北海,黄建华《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王历史》,第65~66页。

⑪哈密公安处《哈密农民暴动史料》,1962年4月,油印本,第6页。

三、哈密“改土归流”过程

光绪三十三年春，牙尔土合曼农民切如拉，由于无力交“征购粮”而面临王府之酷刑，自缢而亡，激起了民众对王府不满。继之王府所属三道岭煤矿因倒塌事故致死农民十七人，王府却冷漠处之，亦未有体恤之情，更加引起了民众普遍愤恨。王府不知体恤民情，一味强征豪夺，终于使得头堡、二堡、三堡、四堡、五堡五百余民众，聚集于吐尔巴克兄弟周围，他们向王府提出：1. 回王的耕地和煤窑全部租给农民，农民按期向回王缴纳赋税，不作无偿代耕。2. 农民每月只给回王当差三天，其余时间由农民自由支配。3. 上项要求须由哈密厅作保后，刻石立碑于王府门前。并发誓如不能实现上述要求，将不要王爷，取消台吉。^①

与此同时，另一支运动的代表人物和加米雅斯，因无力偿还回王的高利贷而与不堪承受王府纳粮供差的杜格买提联合，他们一方面向哈密厅呈控，要求减少粮差，脱离王府的控制而归属哈密厅管辖，希望得到官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利用民族宗教关系向广大下层民众宣传变革思想，以期得到民间力量的支持。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为防止苛政害民，奏请朝廷准许“如有横征苛派病民情弊，许回民赴官申理”^②。故而和加米雅斯等人直接到哈密厅呈控王府横征暴敛，要求归哈密厅直接管辖。哈密情事，左宗棠奏改在先，刘锦棠肯定在后，并都得到了清政府的许可。因之，哈密厅通判陈天禄“接收稟词”，其后联魁在奏折中评其“不察度是非，后亦未详请示遵”，但联魁所指，并非意陈不查，而是谓陈没有很好地认清形势，把握时机。陈天禄之为合乎大势，但是却未及时禀报巡抚。而对于陈天禄而言，先有成例在前，又有民众支持。对于王府改革应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理当是水到渠成之事。故而，其收受稟呈，着手“改土归流”。

在哈密厅的支持下，民众封砌王府大门，迫使王府向哈密厅求援。但在哈密厅默许下，事情的处理出现了反复。联魁饬令甘肃候补道杨增新就近查办。此亦表明联魁业已知哈密厅与王府之间的问题，意欲在平息事态前提下调解厅府之间矛盾。虽有百数十民众闹事，但是事态发展还在官府可控范围之内。如就此而言，表明新疆巡抚方面对于哈密厅的行为最起码是不置可否，这就使得事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杨增新的调解之下，王府方面暂时做出了让步，同意由杨增新拟定、新疆巡抚联魁批准的《缠民供支回部粮差章程》，释放和加米雅斯、杜格买提等人，减少了王府的粮差供应。应该说在此一阶段，新疆巡抚、哈密厅、杨增新等方面在对王府立场上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之后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变故。“嗣后陈天禄突将匪党毛拉惹吉派充乡约，该毛拉惹吉复听和加米雅斯、杜格买提唆使，聚众抱经盟誓，复入回城滋闹，威胁城乡善良缠民不许归回王管辖。”^③由于第一阶段的结果只是解决了回部民众差粮赋税问题，对于王府与哈密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因此陈天禄将毛拉惹吉派充乡约，利用其宗教、民族身份四处活动，联络民众。陈之本意以图利用来自民间的力量，对王府施加压力，从而进行“改土归流”工作。

① 哈密公安处 《哈密农民暴动史料》，油印本，第5页。

② 《哈密回务请由哈密通判兼筹折》（1880年9月11日），左宗棠 《左宗棠奏稿·七》，第585页。

③ 联魁 《讯结哈密缠回聚众滋事分别惩办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一一五册，第574页。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撤销伯克制度,巡抚刘锦棠“通飭南路各厅州县,传集各该城关事务繁间,分设乡约……其乡庄地远,骤难户晓,旧有之伯克暂仍不裁,遇有缺额,亦不另补,以期渐照城关,一律改设乡约”^①。在新疆实行省制过程中,旧有的王公伯克制度逐渐裁汰,代之为省、府、厅、州、县、乡约制度。乡约制的实施,“据各属禀报,自城关伯克后,经年以来,甚觉相安,回民去其壅蔽,亦意渐与官亲。”^②1906年,马达汉就注意到乡约穿戴的都是“清朝低级官员的制服”^③。乡约主要职能在于承办公务、劝化乡人、稽查匪类、催缴赋税、征派徭役、管理农田水利等经济活动,^④“乡约承长官之派充”,^⑤自然听命于官厅。

新疆设省之时,哈密因在历次平叛征战中效力颇多,以故没有进行省制改革。哈密厅通判直接派充毛拉充当乡约,并利用其民族宗教身份四处活动,王府方面对此颇为敏感,因其直接威胁到旧有札萨克旗制的存废。因此,回王刻即上呈新疆巡抚联魁,奏劾通判陈天禄并请省府妥为处理。为了抑制事态的发展,联魁被迫将陈天禄撤任调省查办,电调巴里坤镇总兵易盛富单骑前往,会同地方文武剴切劝导,以期消患于无形,表明此时新疆巡抚方面对于事情之原委认识颇为清晰。调走陈天禄,化解哈密厅与回王府之间的矛盾,求得地方安稳,这应该说,事情发展至此应告一段落。但八月十三日,却发生毛拉惹吉复纠集千数百人进入回城闹事,此时形势亦发生了微妙变化,此阶段群众运动并没有重提脱离王府、划归哈密厅管辖等口号。究竟何种缘由导致民众再起,相关资料并无记载。但是根据后来事情发展以及民国初年铁木尔事变,可能的情况是王府方面重金贿赂易盛富、代理通判周应莱等人,意欲废除杨增新订立之章程,恢复以前状态。^⑥笔者认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改土归流”运动,实质上并没有减轻哈密民众的粮赋、徭役。哈密民众为了维护前一阶段的斗争成果,在毛拉惹吉带领之下,再次进入回城,包围王府,以期最终减轻王府摊派的沉重负担。

四、民众、王府与地方——朝廷艰难之抉择

此次哈密民众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赋税、徭役负担,脱离王府之统治,划归政府管辖,其始终没有反对政府的性质。事变中清政府之角色亦颇为尴尬。陈天禄“改土归流”的主要目的“想自己把税收入国家税库”^⑦,因而前期得到了政府的默许,后来由于王府方面的强烈反对,清政府在权衡利弊后,宣布民众围攻王府“形同叛逆”,并电飭该处文武会同王府将首要各犯就近讯供,并委属哈密通判刘润道会同巴里坤总兵易盛富对和加米雅斯、杜格买提进行复

① 刘锦棠《酌裁回官恩赏回目顶戴折》,《刘襄勤公奏稿》,卷十,第1246页。

②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七十四,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9年。

③ (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第56页。

④ 段自成《清末民初新疆乡约的特点》,《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⑤ 《指令尉犁县知事廖振鸿禀陈讼案谕乡约处息文》,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第5册,辛集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2665页。

⑥ 马达汉在其考察日记记载“军事长官(易盛富)在得了大量的贿银后也急于使事件有个了结”,此亦可佐证事情之变故。见《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第326页。

⑦ 王家骥《马达汉》,马大正主编《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审，最终以敛钱聚众，捏控回王，哄闹回城行同叛逆，问拟定罪。和加米雅斯、杜格买提、毛拉惹吉比照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聚众敛钱，钩讼哄堂塞署，为首斩梟例，拟以斩梟，遵照新章，改为斩决。赴省城民众“当时并未在场，当即分别讯结，以免株累”。回部粮差讯明回王，尚无苛派情事，饬照定章供支。讯明回王究竟怎样，遵照章程若何，并无明文。因此“改土归流”之成果隐没矣。

事实上，“挑起民众骚乱的是一位当地官员”，^①此令清政府处境颇为难堪，在王府、总兵、通判会审之下，毛拉惹吉供称“该革员（陈天禄）主使一节”，使得清政府在处理时有些棘手。最后不得不以“到省上控诸缠民供词尚无实据”相开脱。对于此一转折，马达汉后来在哈密听到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15个维吾尔人被抓，镇台、协台、代理办事大臣和沙亲王共同审讯，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招认向办事大臣（因发生事件被召去了乌鲁木齐）交了1500两银子，让他们只需简单地认同自己是中国臣民，就可摆脱对亲王的赋税和劳役负担。在严厉的刑罚下，只有一人承认有罪，于是他免于遭受更多的折磨。老百姓说，那个1500两银子的案子完全是沙亲王自己与军事长官编造出来的。”^②清政府虽明白其中曲直，但为了使得事情尽快完结，安抚王府方面，最终以“滥受禀词，不明权限，又将匪党派充乡约，以致辗转勾结，酿成巨案。虽非主使，而纵容之情显然，若仅于革职不足儆来，应请永不叙用，以儆官邪，仍俟交代清楚勒令回籍，不准在新逗留”^③的处置。一场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就此而结。

面对民众汹汹之情，通判恺切之意，王府惶恐之态，清政府最终选择了王府，放弃了哈密厅通判，镇压了反抗民众，原本下和民意、中通吏情、上顺“天”意的“改土归流”运动，最终演变为王府与政府之间的联合，采取了逆大势所趋的措施。

清末全国政局变化使然。清朝末年，严重的边疆、政治危机使得清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原有的御边政策，原有的“从俗从宜”“不易其俗”的方针，^④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为此，中央政府加强了藩属内属、行政一体化的进程。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赵尔丰被任命为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慎固内地之藩属”，^⑤开始川边“改土归流”。同年四月，朝廷任命张荫棠副都统衔，以驻藏帮办大臣身份前往西藏“查办藏事”，光绪三十三年三月，正式颁布《传谕善后问题二十四条》，^⑥开始全面对藏事进行改革。日俄战争之后，蒙古局势日趋紧张，1905年5月练兵处军政司副使姚锡光在《实边条约》中提出蒙古改建行省主张，^⑦1907年5月，湖广总督岑春煊在《统筹西北全局酌拟变通办法折》中提出对西、北边疆各部之传统体制，必须进行“变通”，加强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建立行省，“以一事权”。^⑧而陈天禄哈密“改土归流”时值政府对中央与地方管制自上而下改革之际，从其所处周围环境言之，亦可为迎合了朝廷和周围形势发展的需

① 王家骥《马达汉》，马大正主编《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第184页。

② [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第326页。

③ 《德宗实录》，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二月丙寅。

④ 《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戊寅正月癸卯。

⑤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卷，1989年，第90页。

⑥ 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卷一，张荫棠《张荫棠奏牍》，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年，第31~32页。

⑦ 姚锡光《筹蒙刍议》，卷上，《实边条约》，1908年北京刻本。

⑧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辑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卷，第921~926页。

要。但是由于哈密所处之地理位置,“盖哈密山缠多有与科乌蒙古接壤之处”,其一发而牵动整个西部、西北地区,因之,“不宜操之过急”,^①应缓慢图之。然而,陈天禄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没有谋取巡抚方面直接支持,而是转而谋诸民间,利用毛拉惹吉的宗教、民族身份对广大下层民众进行宣传动员,这样就引起巡抚乃至朝廷方面的担忧,同治回乱的余悸让统治者对民众力量时刻持有戒备心理,利用民间力量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虽其出发点是为朝廷边防稳固考虑,但由于触及了政府隐忧,因此使其在关键时刻被釜底抽薪。再者,历代哈密王府与清朝之间的关系,亦使得朝廷在被迫做出选择时转向了王府一边,这样既可维持与王府关系,借助王府力量统治地方,亦可把出现的问题转嫁到下层官吏身上,把根源上为朝廷与王府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地方官吏与王府之间的矛盾,继续维持朝廷在地方的地位和统治。

哈密“改土归流”反映了清末“藩部内属、行政一体”的边疆民族政策的变化,但囿于国力及边疆形势的变化,最终不得不上与旧有力量相妥协的道路。由于“历代哈密王作为伊斯兰王公都只是在清皇室的庇护下才能行使领主权,才有可能拥有对属民的一切专权”^②,故而1912年清朝灭亡后,以铁木尔为首的农民“改土归流”再次兴起,杨增新曾就此提出,“将不服回王之缠民改土归流实为正本清源之法。拟以哈密附近及山外缠民仍照旧归回王管辖。其山内缠民概归地方官管辖,岁纳赋税,由地方官征收,悉数转给回王以作津贴”,但又认为“……不宜操之过急,盖哈密山缠多有与科乌蒙古接壤之处,自库伦独立后,蒙民时有煽动缠民之思,若不恩威并用,专恃兵力,适足以驱之使叛”。^③因此,哈密地区的“改土归流”一直到金树仁统治时期才真正完成。

(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民族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李文博

责任校对: 陈 霞

① 《电呈哈密回部屡叛原由拟将来改土归流并现在办法文》,杨增新 《补过斋文牍》,乙集一,第308~312页。

② [日]佐口透著;邢玉林,阿拉腾奥其尔译 《新疆哈密的伊斯兰王国——哈密郡王统领史》,《东洋学报》1991年第72卷第3、4号。

③ 《电呈哈密回部屡叛原由拟将来改土归流并现在办法文》,杨增新 《补过斋文牍》,乙集一,第308~312页。

the policy for control over Xinjiang was adjusted to consolidate the rule.

Key words: Wushi Incident; Xinjiang; Border control; Khokand

A study on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in Hami in late Qing Guo Shengli (44)

Abstract: Facing the border crisis of late Qing ,Chen Tianlu ,Tongpan (an official title) of Hami , launched a movement to reform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in Hami in the 33rd year of Guang Xu reign. This reflected a historical trend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in frontier ethnic areas in late Qing. Though failed at last ,this movement was of a huge influence in Hami.

Key words: Chen tianlu; Hami;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Samhsot

Francis Younghusband and British expansion into Xinjiang and Tibet Liang Junyan (55)

Abstract: In the time of British contest against Russia in Central Asia ,Francis Younghusband conducted explorations deep in Xinjiang and Tibet ,and then even military aggression in Tibet; these aggravated the border crisis of our modern country.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role Younghusband played in British expansion into Xinjiang and Tibet of our county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ies on related questions by using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rchives and documents.

Key words: Francis Younghusband; British expansion; Xinjiang; Tibet

A study on ancient paper sheets from Astana – Khara Khoja graves in Turfan

Li Xiaochen Zhen Boqiu Wang Bo (62)

Abstract: The ancient paper sheets from Khara – Khoja dated between Jin and Tang dynasties through appearance observation and fibre analysis. This paper is purposed to study techniques of these paper sheets. 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y are made of ramie ,hemp and bark ,including pouring paper and vat paper under processes of single surface ,double surface or pulp gluing and dyeing. This means that these processing techniques were widely used Xinjiang. This paper explains in a sense of how the paper sheets and paper – making techniques were introduced into Xinjiang.

Key words: Khara – Khoja graves; ancient paper sheets; fibre analysis; pouring paper; vat pappter; processed paper; gluing

A genealogical study on Pugu Tribe of Tang Dynasty:

focused on the Pugu's epitaph newly found in Mongol Yang Fuxue (69)

Abstract: The well – preserved “Pugu's epitaph” recently unearthed on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Tula River ,west of Ulan Bator ,Mongol ,contributes to clarify the lineage of Pugu tribe for its key contents. The Pugu tribe was one of the nine outer tribes of Uyghur ,which was not recorded so clearly in historical books. There were only three descents listed in the two Tang Annals: Gelanbayan – Yiliduoba – Pughua-ien; and even this was fault. According to the epitaph and related historical recordings ,there should be nine descents: Gelanbayan – Sifu – Yitu – Yiming – Shezhi – Yeleige – Shaomo – Yiliduoba – Pughua-ien. There is a strong presumption that Pughua-ien's birth day is between 716 and 718 according to the epitaph and related materials ,though the annals did not recorded it.